



书院简介

中梅书院，位于益阳市安化县梅城镇，由安化县令赵尺璧于清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创建，先后易名为崇文书院、培英堂等，1902年开办新学，现为安化县第一中学。书院培养了大批栋梁，如道光时期重臣、学者、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陶澍，云贵总督罗典，书法家黄自元等。

初夏，我们驱车在宛若迷宫的大山褶皱间穿行，沿途的茶树毛竹拥着青瓦邃户、吊脚木楼扑面而来……不觉间，我们抵达了中梅书院的所在古镇梅城。

生境：书院栖身的“中间圈”

1917年盛夏，两个身着长衫的青年登上了安化梅城的制高点北宝塔。站在与学宫相望、修建于嘉庆十年以“助文芳”的风水塔上，这俩从长沙徒步出发，沿途访贫问苦，求谒鸿儒、行乞游学、遍览名胜的学生异常兴奋。其中一人忽然诗兴勃发，从包袱中掏出笔墨，在第七层的塔壁上写下了首题壁诗：洢水拖蓝，紫云反照，铜钟滴水，梅岭寒泉。诗的作者是24岁的毛泽东，而同伴就是萧子升。青年毛泽东融视觉、听觉、触觉为一炉，仅用四句就勾摹出了中梅书院栖身安驻的梅城“生境”。这也成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一首题壁诗。

面芙蓉，背紫云，洢水环抱，双塔并峙的梅城，一直以来都是“梅山文化”的中心，是安化资深的县城。芙蓉山绵亘千里，屏障于东，主峰云雾山高耸入云，秋高气爽，登临可眺洞庭归帆，薄暮能见长沙灯火。山麓寺庵林立，芙蓉寺、白云庵、广化寺等错落其间。这与佛教圣地宁乡沩山密印寺仅隔三四十里，历来登临览胜、驻锡进香的高僧大儒、文人香客络绎不绝。宋代理学家张栻曾到此游览，至今可见其读书处“南轩亭”，吟咏卧休的巨石“眼云榻”。这些皆为中梅书院的创建奠定了“生境”基础。

我们在梅城镇镇长王强的引领下，来到了安化一中。中梅书院早已不存，但据清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《安化县志》载，其原址就在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梅城文庙与武庙间。高考前夕，校园静谧异常，我们轻声地沿着文庙万仞宫墙边的小石子路，抚着早已附满苔藓的斑驳砖墙，穿过原为考棚和西学署的中梅文化广场，前往文庙侧门。

文庙墙上有三孔圆洞，中心被塞上了橘子。随行的一中老师解释，这是孩子们敬奉孔圣，祈愿高中的心意，寓意“高考大吉”。眼前是宫墙照壁，正中砌的是明代万历安化知县陈扬明书写的正反两块石碑，墙外为早已漫漶的“瀛洲”，墙内则是正对泮池、楷书写就的“龙门”。依礼制，县内若有学子高中状元，须凿开龙门，在泮池上建状元桥，引学子登桥入殿，祭拜孔子，是为“鲤鱼跃龙门”。宫墙之所以未开正门，是因安化在科举时代不曾出过状元。这三孔圆洞竟有段逸事：清同治六年，中梅书院学子黄自元高中榜眼来文庙祭拜孔圣，一众乡人请其开龙门，他不敢僭越，再三推辞。乡贤们为示褒奖，特在照壁正中凿设三眼，以励后学。

一踏入“贤关”侧门，我便被文庙那盎然的古意所包围，难以移步。我情不自禁地坐上了石阶，脚边是泮池里曳尾、寓意“独占鳌头”的放生甲鱼，眼前是古木地衣盘攀的青石平台。尽管棂星门已不存，但六块青石残基与憨态石狮却依然守望着那孔庙的肃穆。面阔七间的大成门正中，悬挂着集“字圣”黄自元笔迹而成的“中梅书院”匾额。

注目匾额引我陷入沉思：书院所以命名“中梅”，全因这“梅山”有上、中、下之分，安化地处中梅山，故而得名。可若要问这“盖湖南奥区”的“梅山”究竟在哪？恐怕常人难以从地图中将它圈出。经学者近40年研究发现：“梅山”并非山名，而是活跃在湘中雪峰山地区，尤以新化、安化为核心的一大片“半生半熟”，介于文野之间区域的文化载体。

为重新思考和解释中国文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著名人类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基于中国古代的“天下观”将中国人的“世界”划分成了“三圈”：“核心圈”主要是汉人城乡地区的地带，代表了传统的汉文化；“中间圈”包括“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”，“像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甘青地区的‘混杂’区域”；而“外圈”则指今境外的“所谓外国”，代表了真正的外部世界。

在我看来，中梅书院所栖居的生境——“梅山”便属于“中间圈”。起源蚩尤后裔的“梅山蛮”自唐光启二年（886年）开始频繁与“核心圈”的汉人世界发生战争与联系。直到宋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章惇奉命“开梅山”，一改封锁征剿，招降盘踞“化外之地”的“梅山蛮”，并通过将梅山分而治之——大熊山之南以“王化之新地”中取两字，设新化县，属邵州府；大熊山之北，则从“归安德化”中取两字，设安化县，属潭州府——来实现“化生为熟”的怀柔。这一年，安化首任知县毛渐，创建学官，办起县学；宋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大批江西庐陵人奉命迁入“梅山”。中原王朝希望用儒家文化来同化、善化、德化来自“中间圈”的梅山蛮，使之逐渐归服融入“核心圈”，但这“化人”的进程尤为漫长。



安化梅城文庙内万仞宫墙照壁正中寓意“三星高照”的三个圆孔与明万历安化县令陈扬明书写的楷书“龙门”。 蔡鹤云 摄



中梅书院匾额。

蔡鹤云 摄

中梅书院 · 『归安德化』 的加速器

人物：入祀书院的七品知县

清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春，山西临县名宿赵尺璧，怀揣一纸任命和满腔抱负，踏上了前往湖南安化赴任的旅途。梅城“旧不与中国通”的险峻，并未阻挡赵尺璧赴任的脚步，反而坚定了他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决心。甫一上任，他便大刀阔斧整肃吏治，兴利除弊进行改革。

在任上，赵尺璧以清廉著称，更以文教为重；他不畏严寒酷暑，固定每日召诸生到县衙训导；他坚持一月三次，考核诸生文章和经典学习情况；他亲自与县学主管共同阅卷，以排列名次；他目光锐利，审读学生字句细致入微；他重视风范，每逢春冬首月定要邀请县中品行高尚的君子宴会，以示引导勉励……他的到来如一缕春风，为这闭塞山城带来了生机，而“侯之心犹未已也”。

到任一年，赵尺璧走遍了这片虽已“归安”但仍未“德化”的“梅山蛮地”。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中举，靠读书走出吕梁大山入仕为官的赵尺璧，深知要改变一个地方，改变人的命运，必先从教育着手。从宋代“开梅”置县至明代，整个安化只有学宫，未有书院。作为主官的赵尺璧不仅捐出俸禄，亲自选址，鸠工庀材，为全县创办第一所书院；又在书院建成后，再次续捐，以聘请主讲，维系书院。在当时，地方书院多是“乡人出私钱自为创建”，父母官拿自己俸禄在官学外创辟书院，实为罕见。

很多人会疑惑，既有县学，赵尺璧为何另创中梅书院？明清规定，只有入官学受教，学子方能取得科考资格，但明清的官学深受政治腐败、财政危机影响，教学职能被严重削弱。地方教官除每月朔望于明伦堂宣读朝廷训饬外，主要工作就是主持季考、月课，官学逐渐沦为只有考课而无教学，更无条件住读的科举附庸，名存实亡。《安化县志》载，当时的安化“大道不明，儒术寝坏”，出现了“士虽名列学宫，而散处于四方”的现象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好老师，觉得自己有学问“以致相互标榜”。

与日渐僵化的官学不同，书院提供了优越的读书环境、浓厚的学术氛围。初看之下，赵尺璧创办书院只是桩捐资助学的善举，但若深入考察清代书院政策的变化——从“百般抑制”到“适度放宽”，再到“寓控制于支持”——你就会被他的胆识与敏锐所折服。

清初，战事频仍，局势未稳，清廷深恐明末讲学议政之风复活，担心书院聚众而为反清阵地，故而对书院

百般抑制。随着国家一统，海内晏然，清庭开始适度放宽书院政策；尽管未有兴办书院的明令，但通过赐书赐额，康熙皇帝传递了对一些著名书院的鼓励，实现了其笼络汉族士子，消融反清观念的目的。直至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清廷方明颁上谕，直言书院可“导进人材”，补官学所不及，将书院以“古侯国之学”的身份列入了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，并屡下谕旨做了制度规定。而此时，赵尺璧所创的中梅书院已开门授业了44年。

在我看来，除了胆识，作为一位最基层的七品县令，赵尺璧的目光比常人看得更远，可谓用心良苦。中梅书院的愿景超越了科举狭隘的目标；在交通、文化闭塞的安化山区，书院竟明确把培养有用之才放在首位，教导诸生“读书不务词华以为目前苟得之计，以诗书为堂奥，以道德为藩篱”，克服片面追求登科利禄之途，做到“从容涵养以成其材”；教育诸生“戴仁而行，抱文而处，文章气节，矜式乡氓”，用优秀文章和高尚品格，给乡里百姓做表率，将中梅书院视为改变地方社会风气的基础，为整片“梅山蛮地”“归安德化”加速。

据载，书院的大门傍对洢水，门额上“中梅书院”四字笔力遒劲。穿过二门及东西耳房，可见前厅“耘桂惹香”的匾额，而考核学生的后厅则高悬着“在兹”的教诲，书院建筑“楼阁崇隆，堂室宽广”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，为远离市井喧嚣，众乡贤倡将书院迁至今址。此后，书院虽历经修葺扩建，但其精神未改。安邑众人对赵尺璧——这位来自山西的知县，始终心怀感激。

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，安化知县陈瑛将办学111年的中梅书院，更名为崇文书院。为纪念赵尺璧的创始之功，陈瑛将其牌位供于书院，与周敦颐、程颐、朱熹、张栻等儒学大师同列，并将“除先儒外，只奉前知县赵尺璧一位，以其创书院捐膏火，不忘所自也，后之……不得滥入”永久写入了书院《条规》。

与我们现在将教育机构作为公共空间，置于凡俗世界不同，古代书院是深具礼仪意味的“神圣空间”，其祭祀对象有着明显的宗派特点，只有在书院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才有机会被后世供奉。此时，配祀书院的赵尺璧，早已超越了其创办者的角色，成了百年中梅得以凝聚力量的精神图腾。

文脉：梅城是个读书的好地方

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六月，黄河泛滥，运河受塞，清王朝的生命线“漕粮运输”岌岌可危，作为运河枢纽、漕运要冲的江苏尤为关键。“海运漕粮”的公文堆满了陶澍的案头，刚从安徽调任江苏巡抚的他，与苏州布政使贺长龄、幕僚魏源等人，正日夜筹谋着这关系国家命脉的计划。一日，一封来自湖南安化的家书打破了夜的宁静，信中报喜：安邑学宫重修已毕，竣工典礼召开在即。已17年未曾归乡的陶澍心头一震，手中之笔不由停顿。

陶澍在月光下推开窗棂，院落里树影摇曳，仿佛带他回到了少年：12岁那年，母亲病逝，家道中落，父亲外出教书收入微薄。陶澍与父亲相依为命，而他的弟妹只能分别在家劳作或寄人篱下。尽管如此，13岁的陶澍并未弃学，他随父亲来到安化县城督修南塔，住在学宫旁的简陋工棚。白天，父亲忙于南塔建设，陶澍则以童生身份，受教于学官之侧的中梅书院；深夜，父亲坚持在工棚中辅导陶澍，那“一灯荧然”下是父亲严厉又期盼的目光……

梅城山水，学官书院的良好氛围，令少年陶澍才思大进。一次，安化县令余肇锡视察学官，偶然发现陶澍的文卷，余县令被其气势磅礴的诗文所吸引，在文卷上留下了“小儿学语半未成，闻声已具食牛力”的评语。此事传到了中梅书院主讲王崇纲耳中，他特地索要了陶澍的诗作，在读毕《屺思吟》后赞叹不已，为陶澍题诗，寄望后学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18岁的陶澍在安化学官的考棚中参加县试，以院试第二考中“秀才”，被安化县学录为诸生，开始了他的功名之路。

陶澍的感觉没有错，身处“中间圈”的安化学子，通过书院的教育，开始屡中甲科，以安邑文化群体的面貌“于然接队”地踏上了“核心圈”的历史舞台。

诸如罗绕典、龙锡庆、黄德濂、黄自元、贺宗章、丁连科、黄凤岐等，官至总督、布政使、道台、知府、副将等。他们之中或受爱民惜物和经世致用思想影响，在整肃吏治、兴修水利、改革盐政、赈救灾荒、振兴教化等方面做出成绩；或为抗御外侮、守卫边疆作出贡献；还有一批博

学才、熟读经史的著名宿儒，或在府、州、县学任职，或主讲书院，或著述宏博。据统计，清朝安化有进士7人、举人178人、贡生175人、七品以上文职官员130余人；武进士1人、武举15人、干总、守备以上武职官员80余人。要知道，自北宋安化“开梅”至明朝覆灭，572年间，安化通过科举脱颖而出者仅进士5人、举人24人、贡生170人，七品以上文职官员60多人……

而“梅山蛮地”何以大跨步地“归安德化”？陶澍在《重修安化县学官记》中透露了历史“加速”的缘由——“夫礼乐之地，教化所兴”：自中梅书院创于梅城后，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赵尺璧捐俸于城西建义学；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李太和等于官溪创义学；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，李照轩等于桥头河创丰乐书院；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黄岱钟等于三都鸦雀坪创演乐书院……安化的书院、义学、社学如雨后春笋。

细观中梅书院，自迁于今址，书院建筑的修缮、桌椅藏书的添置从未停止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；历任山长均为贡生乡举，文行兼优，教学质量有口皆碑；历任知县、书院生员、乡贤名宦均慷慨捐赠，教育经费源源不绝。书院以其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文脉，深刻改变了安化的社会风气：乾嘉以降，“十户之村不废诵读”，“远山深谷，居民之处，无不有师有学”；时至今日，送读苦读，崇文尚学之风，依然如昔。

三百多年坚持办学，中梅书院培养了大批栋梁。陶澍、罗绕典、黄自元等，或出任疆圻，或蜚声翰林，他们的鹏程均发轫于中梅。随着时代变迁，中梅书院也经历了从书院到高等小学堂，再到师范和中学的转变，但其承继于中梅的文脉精神从未中断。作为中梅书院的现代延续，安化一中近年来的高考成绩斐然卓越，屡有学子被清华、北大等顶尖学府录取，并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龙驭球、中国科学院俞汝勤两位院士。

不得不承认，中梅书院的创设与发展使安化这片“梅山蛮地”摆脱了边荒之所的文化落后，逐渐“德化”为文教重镇。你可能想象不到，中梅书院所栖身的安化梅城，在仅6.5平方公里的城区内常住近9万人，而其中近2万是来自全县各地、怀揣梦想的莘莘学子。

立秋，坐在长沙图书馆撰写文章的我，面对满目书山，不禁回味起了梅城镇镇长王强常挂嘴边的：“梅城是个读书的好地方！”中梅书院宛若一座文脉的灯塔，穿行历史的烟云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安化人前行的道路。



我与湖南日报

有一些人，从未谋面，却念念难忘；有份报纸，方寸天地，却温热世界；有一摞稿子，已经发黄，却越发芳香……

那是1993年3月，我写了一篇《首先“自扫门前雪”》的文章，寄到《湖南日报》。这是我第一次写言论稿，写的是一个学生味很浓的论说文。没过多久，却收到了理论部编辑的回信：“思路可以，但要修改一下，写成随笔杂文，述举点例子，不作说论文来写。请改好后满意了，再寄来。”信中还建议我将题目改为《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》。

文章要完全推倒重来，而当时的我并不熟悉杂文的写作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。但有编辑的肯定、期待和指导，我便研学和借鉴一些杂文经典名篇，重新构思和组织文章。经过一番冥思苦想，写出了第二稿，又寄给编辑。

稿子寄出不久，又收到编辑的回信：“大作我作前后改了，中间一下子改不出来，望你再改一下，并将文字写好一些，写工整一些，写为千字杂文，再寄我，如何？”再翻开稿子一看，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笔批注，颇有点“全国江山一片红”的味道。有一段修改较少，但“这里你自己改了”的几个字标注，很醒目，也很亲切。从材料甄选到写作手法，从段落结构到用词用典，甚至连个别标点符号的用法，编辑无一不作了详细的批改和指导。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时阅读这些修改意见时，我眼眶里溢出了感动的泪水。

那时的我才开始写作，这方面的领悟能力有限，每次修改总是达不到编辑的要求。可是，编辑每收到我的修改稿之后，总是耐心指导我进行反复修改，没有一点责难，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，字里行间是满满的商量、尊重、欣赏和激励。那时电子邮件还没有普及，编辑与我的沟通完全得通过邮局信件的往来，既耗时、麻烦，又不得劲。可是，编辑一点也不厌烦。就这样他寄来我寄去，先后给我寄了7次修改意见。经过7轮修改，1993年12月2日，我这篇杂文处女作终于在《湖南日报》上见报了。

也许你不一定相信，会有一个编辑愿意花10个月的时间指导一个素不相识的作者修改一篇小文章；也许你不一定相信，这些被编辑修改过的稿子，历经30多年，已经发黄，现在还被我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；也许你不一定相信，这一次“临床”式的写作修改指导，让我学会了写杂文，后来还被省杂文学会吸收为会员。但是，请你一定相信，这种编辑热心扶助作者快速成长的故事，在《湖南日报》完全是平常事；请你一定相信，《湖南日报》不仅有真理的光芒照耀你，还有人性的光辉温暖你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杂文学会会员、湘潭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那一摞发黄的稿子

廖和平

